

中国农业年鉴增刊

中国农业经济论文选

(1981)

中国农业年鉴编辑部编

农 业 出 版 社

中国农业年鉴增刊
中国农业经济论文选
(1981)

中国农业年鉴编辑部编

农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3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6开本 6.5印张 251千字

1983年5月第1版 1983年5月上海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4144·462 国内定价 1.50元

目 录

2043/35-78

坚持农业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	邓力群	1
坚持发扬“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精神·····	王任重	3
调整国民经济 搞好综合平衡·····	薛暮桥	5
改革服从调整 改革促进调整·····	于光远	9
从美国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看中国农业发展·····	钱俊瑞	11
建国以来国民经济的发展和顿挫·····	许涤新	12
农业生产责任制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杜润生	18
走中国自己农业现代化的路子·····	何 康	24
发展农业的正确决策·····	詹 武	24
我国农业的基本特点和发展战略·····	石 山	29
论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战略·····	中国科学院农业现代化研究委员会供稿	33
关于改善党对集体农业领导的问题·····	贺致平 杨坚白	36
认真落实自留山 大力营造薪炭林·····	张平化	42
认真抓好林业经济研究工作·····	雍文涛	43
关于畜牧业的几个问题·····	许涤新	47
在调整中前进的我国社会主义畜牧业·····	蔡子伟	51
我国能源结构分析与农业现代化·····	吴相淦	57
改革耕作制度要按照自然和经济规律办事·····	刘瑞龙	61
生态平衡和农业发展·····	王耕今	62
调整布局 发挥优势 加速农业发展·····	郑 重	66
发展渔业的几个问题·····	肖 鹏	70
国营农场要走农工商综合经营的道路·····	赵 凡	71
从当前农业机械化问题的争论说起·····	项 南	77
我国的水资源和水利建设·····	李伯宁	81
贯彻调整方针 做好财政支农工作·····	江东平	87
进一步解放思想 因地制宜 搞好农业生产责任制·····	谭启龙	89
既鼓励富队更富又扶持穷队快变·····	杨易辰	91
提倡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	江渭清	92
积极引导社队工业在调整中前进·····	许家屯	94
加强领导 改革体制 积极发展农工商联合企业·····	张根生	96
阳关道与独木桥		
试谈包产到户的由来、利弊、性质和前景·····	吴 象	98

坚持农业发展的 社会主义道路

邓 力 群

加快发展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可以这样说：不了解农村，就不能说了解中国；农村的事没办好，中国的事也不能说办好了。现在中国有十亿人口，其中八亿是农民。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农民多，生产力落后；工人少，但它代表先进的生产力。这个问题是决定中国革命、以至革命胜利以后相当长时期的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是决定我们的一切战略、策略和一切基本政策的出发点。革命时期是如此，建设时期仍然如此。

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历史功勋。其中非常突出的一点，就是领导我们党，立了这样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即代表工人阶级把中国广大农民团结起来，进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武装革命，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取得城市，取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接着又把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引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

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也犯过错误。这些错误，使我们没有能够取得预期的成果，走了一些弯路。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已经大为提高，正如《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党认真补救农业合作化后期以来农村工作上的失误，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推行各种形式的联产计酬责任制，恢复并适当扩大自留地，恢复农村集市贸易，发展农副业和多种经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历史的教训，这是需要我们认真记取的。如果我们能使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八亿农民政治上翻身，经济上也

翻身，并且生产和生活越来越好，使农村真正发展成为富裕的、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那我们整个国家的面貌就会大为改观。我们把八亿农民的事情真正搞好了，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将有伟大的意义。为了这个事业，是值得把全部精力贡献出去的，是值得为之牺牲一切的。

一个中国人，眼里没有八亿农民，不能不说是认识上的很大的缺陷。我们有少数这样的青年人：在农村的想方设法要挤到城市里，在城市的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他们瞧不起农民，眼里、心里都没有八亿农民。这是一种不健康的情绪。历史上常有这种事情：心里记挂着农民的，为农民服务的，农民就想到他；忘记农民的，不为农民服务的，农民就抛弃他。我们的农民不会失去正确判断谁是他们的真正朋友的能力。真正为农民尽力的，为他们的解放事业献身和作出牺牲的，包括知识分子，农民将永远记着他们。

要使广大农村落后的面貌大变，使八亿农民富裕起来，要做的工作很多。但是从大的方面说来，还是必须走他们已经选定的道路——社会主义道路。研究中国农村的发展，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下农村的发展。离开这个道路来谈农村的发展，就不会有希望。

我想谈一点过去搞土改时看到的情况。吉林榆树县的土地、房屋大量集中于地主手里。自己有几亩地的贫农很少，人数最多的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垅”的雇农，占到农村人口的60~70%。地主占那么多土地、房屋，怎么经营呢？他出租土地，要看你有没有一套车马犁耙，就是三匹马一张犁。有了这些东西才能取得租地的资格。大量的雇农，是没有这样的资格的。土改后，贫雇农分到了土地和牲口，可是牲口怎么办呢？你分一个，我分一个，他分一个。那个地方一个牲口无法种地，于是只好几户凑个互助组，自愿结合，提出了互助合作的要求。要搞生产就必须互助。后来我又到了新疆。那里大部分农牧区还处在封建社会中期，生产力低下，生产关系也落后。但是土地改革以后农牧民也要求互助合作。所以说，搞合作化，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共产党强加的，而是农民自己的意愿，是社会前进、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说合作化搞错了的人，相当多的是因为不懂这个道理，没有参加减租反霸，没有参加土改，人云亦云。其中也有老干部。但是老干部中间，也有没有做过多少农村工作，没到农民

中去较长时间的人。说合作社后期搞得快了一点，工作搞得粗了一点，这是事实。但据此全盘否定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否定搞合作化，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我们过去的提法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仔细推敲研究一番，就会看出这不太准确。应该说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个包括多方面的内容，需要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完成的任务。包括解决所有制方面的问题，需要很长的过程，这个过程要一直延伸到共产主义。按照过去那个提法，好象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基本完成。这样就容易造成急性病，急于过渡嘛。现在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在这个基础上，今后还要继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就农村来讲，把私有制改造为公有制，意义是非常伟大的。可以设想，如果土改之后，我们不搞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让私有制长期存在下去，那会怎么样呢？毛泽东同志当时就看到，农村已经发生分化，继续发展下去，分化必然越来越严重。中国有一个重要特点，是土地少人口多。土地私有制不改造，不发生分化才怪哩。我们及时地把个体农民的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土地个人私有变为集体公有，这就避免了分化。这恰恰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成功的经验。在具体步骤上，尽管我们也不是没有错误，但从全国范围看，甚至在林彪、“四人帮”为害甚烈的十年里，公有制也没有公开地大量地退回到私有制去，这个事实本身，难道还不足以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农村有着深厚的基础和巨大的生命力，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由衷的热爱和欢迎吗？这难道是光靠共产党下命令能够做到的吗？

至于包产到户，这是争论多年的问题。最早是困难时期安徽提出来的，当时有的同志坚决反对。陈云同志表示，何必那么急急忙忙地反对，让它实验几年再看好不好？现在来看，陈云同志这个意见是完全正确的。1962年邓子恢同志派人调查，凡是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都比不实行的强得多。自留地种得最好，包产到户的地次之，不是自留地、又不搞包产到户的地最差。邓子恢同志说，这是合作化以来经营管理方面的一大创造。党内多数同志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现在越看越清楚，中国农村生产资料中土地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保持了土地公有制，在这个基础上搞各种形式的联产计酬责任制、包产到户，就找到了适合生产力性质、受到农民欢迎、又能促进农业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得到巩固和发展的经营管理方式。很清楚，这种包产到户是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包产到户，尽管是大包干，也绝不是分田到户，更不是单干。

耀邦同志最近说，我们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正确的，从土地私有制到公有制，是一个很深刻、很伟大的变革。对广大农民的这种普遍的、强烈的要求和有深刻现实依据的历史性创造活动，必

须给予肯定。我们在实现对农业方面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在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方面，在解决集体经济基础上关于发展生产、组织生产、搞责任制、收益分配等一系列问题上，虽然也不断地摸索，但是长期没有找到合适的办法，而且犯了很多错误，只有到了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才上了路。现在，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各地农村都有很多新创造。“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样，我们的集体经济就更加巩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能更好地发挥。包产到户是公有制基础上经营管理方面的创造。这个问题，目前根据实际材料从理论上加以阐发，还作得不够。

实现包产到户以后，已经出现了新的生产联合、专业分工。例如，甘肃一向很穷，包产到户搞起来以后，自然地产生了一种生产上进行分工和联合的需要。有个生产队有台电磨，包产到户后，有人提议把电磨卖掉，每家分几个钱。一讨论，多数人不同意卖，电磨留下了。经营管理有了一点改善，挣了点钱。有人又提议把钱分掉。多数人主张再买一台电磨。增加了电磨，又需要增加几个人。这不是分化出几个劳动力去搞粮食加工了吗？挣的钱多了，除了用于扩大再生产的部分，也分给社员一些，使家家增加了收入。包产到户以后，羊增加了，各家自己放，很不方便。有人提出干脆把羊凑到一起，搞个劳动力专门放羊。这样，不是又有劳动力去干这件事了吗？地也可以由几个主要劳动力带着各家的辅助劳力种起来，其他人搞点别的副业。这说明，实行包产到户后，由于分工的要求、专业化的要求，各种新形式的联合开始产生了。包产到户存在多种多样的形式，它是不会停滞、凝固的。生产积极性发挥出来之后，生产发展之后，专业化分工和联合是必然要提出来的要求。

关于包产到户，一条，这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经营管理方面的创造；另一条，新的专业化分工和联合，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总是会出现的。从事实出发，把这两条讲清楚，就可以说服更多的人，打消怀疑者的顾虑。同时，也只有不断地总结经验，深化我们的认识，才能使党的政策进一步贯彻下去，真正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

这是只就包产到户一种经营管理方式而言。现在全国各地农村，在专业化分工、联产奖励、联产到劳等方面，形式是很多的，说明集体经济的生命力越来越强了，开始找到了从经济上不断巩固发展自己的道路。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我们搞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会错。决不能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丝毫动摇。当然，极个别地区，十里、八里才有一户人家，要联也联不起来，勉强去联，实在劳民伤财，农民也不欢迎，生产也受到妨碍。这类个别地方，中央的政策允许单干。它数量很小，不会影响我们社会的性质，不会影响我们的根本方向。研究农村问题、农业发展问题，一定要坚持这样一个根本立场。在这个问题上，必须站稳脚跟，守住阵地，然后稳步前进。

经过三中全会以来两年多的工作，过去在左的束缚下被压抑着的正确的东西，得到了解放，过去做错了的事情，现在总结了经验，也知道该怎么去做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天天讲“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那是凭空捏造出来的。林彪、“四人帮”压抑真正的新生事物。这两年，真正的新生事物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到处涌现出来。不同的经济条件，不同的气候条件，不同的土壤条件，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耕作习惯，不同的行业，都有各式各样的创造。所以我们的研究工作，就是要充分地去发现广大农民、广大农村干部在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创造出的大批新鲜事物，从中总结经验。书是要看的，脑子是要想的。要有思维活动，要有抽象推理。这都没问题。但基本点一定要建立在发现事物之间的客观联系，发现有生命力的新鲜事物上。

外国的经验值得借鉴。毛泽东同志就提倡古今中外进行比较。外国人的情况和观点要了解，但是要从我们的实际出发，有批判地加以吸收。这虽然是老话，但真正要学会运用这个方法，确实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也不是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就能做到的，不是靠偷懒能够做到的。不要以为我什么都了解了，什么都掌握了，一定要虚怀若谷。要坚定地相信，富有生命力的东西，永远来自人民，农业问题方面的富有生命力的东西，必然来自八亿农民。我们是要帮助农民的，我们也负有教育农民的责任，但首先要向他们学习，向他们请教。要把他们的东西加以总结提高，这里头就有我们的用武之地。要勤勤恳恳地把八亿农民创造的东西记录下来。记录下来以后，加以整理，加以提高。经常深入基层，了解实际情况，这是不容易的。但是了解了还不等于已经成为科学了。了解了，还要经过推理、判断等加工制作，找出现象间的内部的客观联系，即找出其发展规律，使之变为科学。这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恩格斯说得好，要善于使用概念，要善于抽象，要善于理解。比如《资本论》，马克思在伦敦博物馆看了很多很多书，其中不少白皮书之类的书。没有那些书，没有那些材料，他写不成《资本论》。可是把那些东西堆在一起，是不是就有了《资本论》呢？那就不是《资本论》，而是白皮书的汇集而已。

搞一个农业战略规划，已经提上党和国家领导的议程。究竟我们十年内农业应该如何发展？二十年后农村将会是个什么样子？要有个长期规划。这个规划一定要科学、要实际，确实能够使我们的八亿农民在几十年内为世界写下一篇光辉灿烂的历史，把我们的农村、我们的农业发展的历史载入史册。我们都应该为这件关乎子孙后代的大事做出努力，贡献出自己的才智。

坚持发扬“愚公移山 改造中国”的精神

王 任 重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仍然是坚持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倡的：“愚公移山，改造中国”，从根本上改造祖国山河的面貌，改变农业生产靠天吃饭的状况，以保证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当前，围绕调整国民经济这一中心任务，主要是靠政策、靠科学发展农业生产。但从长远看，必须坚持不懈地进行农业基本建设，为农业的高产稳产创造可靠的物质条件，为农林牧渔和工副业全面发展开辟道路。这样，才能加快农业的发展，为工业建设提供比较充分的原料，为人民生活的改善提供丰富多样的产品，同时使我国人民生活有个美好的自然环境。

我们是一个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发展中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大国里，要建设成一个经济上高度发达、政治上高度民主、精神上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必须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加快农业的发展，使农民尽快富裕起来。这是关系到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根本问题。过去我们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所以犯“左”的错误，思想根源就在于没有真正认识我国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这个特点，在重工业及其基本建设的发展上犯了急性病，贪多求快，以致欲速则不达。结果，不但使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而且整个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实际上不是快了，而是慢了。现在中央下决心进行调整，不仅从当前来说是完全必要的，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说，将使我国经济工作从根本上摆脱“左”的一套束缚，真正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坚持走农轻重的路子，把发展农业摆在国民经济的首位。各地在调整中，通过总结建国三十一年来的经验教训，必须使全党在认识上清醒地解决这个问题。

我国农业的现状如何？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如何？建国以来，在农业建设方面是有成绩的。我们实现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了大量的农业基本建设，农业生产条件和技术装备有了显著改善，农业总产值和主要农产品的产量，都有了较大增长，供应了全国众多人口吃、穿的基本需要，支援了工业建设的发展，绝大多数农民生活有了较大改善，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三

十一年来,我国农业发展经历了相当曲折的过程,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刚刚好了几年,就来一次瞎折腾。我们工作中确实有不少失误,确实犯了不少错误。就全国来说,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山河破碎的状况,还远远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我国是人口多耕地少的国家。农业增产,主要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但全国只有一半耕地可以灌溉,其中只有30%以上的耕地能够旱涝保收(特大水旱灾害除外),但仍有50%以上的耕地靠天吃饭。因此,我国农业生产的水平还是低而不稳,每年都有几亿亩耕地遭受程度不同的自然灾害。1980年是南涝北旱,受灾面积达七亿亩之多。我国大江大河,从珠江到辽河,都没有根治,工程搞得最多的淮河流域也还没有根治。在西北地区农业现代化学术讨论会上,专家们说,黄河是最大祸害,“黄河之水天上来”,成为对沿河两岸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威胁。我说长江是悬在我们头上的第一祸害,比黄河还大。全国山地占国土面积的66%,还有很多荒山秃岭没有绿化。坐飞机一到西北,真是一片黄化,很少有象样的森林和草原。我国农业自然资源,从总的数量上看,可以说是地大物博,各种物产都可以讲出几个第一。但问题不能仅看绝对量,还要看相对量,即人均占有量。我们搞农业生产,最终目的要落实到提高人的消费量上。我国由于人口众多,人均自然资源远低于世界平均数而感到不足。同时还要看到,前些年由于我们瞎指挥和政策上的错误,自然资源破坏是很严重的。例如森林资源,多数地区采伐量超过生长量,特别是水源林的破坏,使江河的含沙量增加,河床增高,湖泊、水库淤塞,这是一个很大的危险。还有草原退化、沙荒面积扩大,土壤有机质减少、肥力降低。所以,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自然面貌,为加快农业发展创造最好的条件,大致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间。时间短了是不行的。不能急于求成,不能指望一下子就搞出一个什么奇迹;只能量力而行,循序渐进。

改造中国的自然面貌,坚持进行农业基本建设,当然需要很大的投资。随着国家财政经济情况的逐步好转,农业建设的投资比重应当逐步增加。但是,仅仅依靠国家增加投资是有限的。我们应当充分发挥我国农业劳力资源的优势,每年用20%的劳动力,即大约六千多万人,来搞农业建设一百天,这样等于60亿个劳动日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约等于60亿元的投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发扬“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精神,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努力,切实把以下几个方面的事情办好。

(一)大搞造林种草,实行农林牧结合。植树种草可以保持水土,改造沙漠,改善生态环境。凡是植树种草好的地方,小气候就好,就有了泉水,风沙也大大减少。江河湖泊和水库上游如果不搞好造林种草等生物措施,河床就会升高,湖泊和水库就会淤塞,工程措施就会失去作用乃至报废。整个西

北地区及人少地多的边远地区,应当实行农林牧并举的方针,发展牛羊兔等食草动物,发展养蜂、养蚕和药材,增加畜产品、木本粮油、干鲜果等农副产品。这是当前投资少见效快受益大的事情。当然,不同的地方要因地制宜,有所侧重。在保证粮食生产逐步增长的前提下,逐步退耕还林、还牧,决不能单纯搞粮食,等粮食过了关再搞种树种草。农林牧是有机结合的,物质循环,互相制约,单纯抓粮食,粮食也搞不上去。目前,西北地区农业生产水平低,群众生活困难,由国家调进部分粮食,使农民得以休养生息,调整农业的内部结构,是必要的。但长期依靠从外面调粮食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不划算的,应当逐步做到粮食自给。

(二)要广泛推广应用沼气和节柴灶,扩种薪炭林,有条件的地方要发展小水电,解决农村的能源问题。我国要从根本上制止对森林、草原的破坏,并使大量秸秆还田,必须着眼于能源问题的解决。现在世界上那些森林、草原保护得好的国家,除稳定林权保护森林等法律措施外,最重要的原因是人民群众的生活所用能源全部来自电气化、工业化,合理解决了燃料、用材和饲料问题。人民日常生活迫切需要的问题不解决,制止滥垦乱伐是不能真正做到的。

(三)加强草原建设,搞好围栏放牧和人工草场。饲草、饲料是发展畜牧业的基础,要从制止草原沙化、碱化、退化到改良草原,逐步发展人工种草,增加产草量,控制载畜量。我国畜牧业要在巩固发展生猪生产的前提下,大力发展牛羊兔等食草动物和养禽养蜂,有计划地建设畜牧商品生产基地。提高技术水平,讲究投资效益和畜产品的数量和质量,而不要追求年终存栏数,以提高出栏率和商品率作为检查牧业好坏的标准。

(四)建设高产稳产的基本农田,逐步增加土壤肥力,科学种植,提高单产。目前,还有相当多的低产农田是障碍我国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要采取行之有效的工程、生物和耕作措施,下大力气改造低产田。我国北方的盐碱地,南方的红壤土、冷浸田,西北的沙荒等低产田,共有5亿多亩,其中仅黄淮海平原就有约5千万亩盐碱地。这些低产田亩产粮食生产只有一、二百斤。如加以改造,因地制宜种植和科学施肥,每亩增加200斤,即可增产100亿斤。实验已经证明经过改造的耕地亩产达到600斤,800斤甚至过千斤都是可以办到的。

搞农田基本建设,应因地制宜。人多地少的地方,要改良耕作制度,增加土壤肥力,不能再搞掠夺性生产;人少地多的地方,应当实行草田轮作;黄土高原和山区,要认真建设和种好基本农田,改广种薄收为少种高产多收,逐步退耕还林、还牧。陕西省米脂县高西沟大队,原来1人种7亩地不够吃。现在实行“三三制”,每人只种两亩地,够吃还有余粮,而且林牧业和工副业也发展起来了,恶性循环变成了良性循环,穷队变成了富队。象这样的好典型各地都有。依靠农业劳动力多的条件,我们不但

能够把一切可以利用的国土充分利用起来,发展多种经营,而且可以精耕细作、科学种田,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农作物单产最高的国家。

(五)搞好水利建设。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也是城乡人民和工矿企业不可缺少的资源。我国大江大河流域,从南到北都还未得到根治,更远远未得到充分利用。水旱灾害是当前农业生产的主要危害。农业用水和城市工矿企业的用水都需要加强水利建设。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国家水利建设投资有限,集体也拿不出多少钱来。为此,兴建任何一项水利工程,一定要加强调查研究,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量力而行。要事先作勘察设计、投资预算,选择用钱少而效果好的最佳方案。国家要抓好重点水利工程。长江、黄河是悬在我们头上的两大祸害,其中长江又是第一大祸害。1954年的大水灾造成的损失,大家记忆犹新。假如再来一次1954年的大水,因长江河床升高了,所造成的损失将比1954年大得多。因此,我建议在本世纪末以前,尽可能把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建设起来,力争提前完成。这对防洪、灌溉、发电、航运以及将来南水北调,都有重大意义。各地要重点抓好续建、配套和除险加固水利工程,兴建花钱少、见效快的小型水利工程。切实纠正形式主义、瞎指挥,一平二调等错误使水利建设事业取得更大的成绩。

(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前我国有8亿农民,1.74亿农户,平均每户住宅2分地,共占用土地3千多万亩。现在农村和城镇新建房屋逐年增多,新占耕地也逐年增多,对人多地少的我国来说,这是一个严重问题。如果把现有农村住宅逐步改建为二、三层楼房,约可节省10%的土地。随着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提高,农村居住条件要相应改善,还要发展交通、水利、沼气和“四旁”绿化,这就要求农村在统一规划下,逐步进行改造和建设,以利于繁荣经济和发展文化教育,培养有文化、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新的一代农民。

(七)建设小城镇,走农工商一条龙的道路。要重视农村小城镇的建设,因地制宜发展社队企业,实行农工商综合经营,使之成为农村经济文化中心。这是农村富裕起来的必由之路,是逐步消灭城乡差别的道路。当然,不是现在都去建设小城镇,也不是一两年就搞成,而是有条件的就搞,逐步搞。农村小城镇和交通等建设,都要尽可能少占农田。

(八)继续搞好农业机械化。现在不是要不要搞机械化的问题,而是怎么搞好的问题。要因地制宜,从生产和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要有先有后,有缓有急。要把机械技术现代化与生物技术现代化结合起来,相辅相成,以增产增收、取得最好的经济效益为目标。农业机械还有个管理问题,要恢复和健全各种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不断提高农机的完好率和利用率。

(九)必须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和推广工作,改革农业科研体制,大力培养农业科技人材。每县至少办一所农业中学。要充分相信和依靠农业科技

人员。他们工作很辛苦,但待遇和工资普遍偏低。特别是中级技术人员,四、五十岁,主力是他们,学校教课靠他们,科研靠他们,但他们的工资低,孩子还不大,有的上有老人,生活困难。党和政府了解和关心他们的困难,一定会逐步地加以解决。有些领导干部,自己对农业科学技术不懂又不学,对农业科技人员的工作又不重视、不尊重。过去三十一年中,我们曾经犯过的主观主义、盲目蛮干的错误,就是吃了不尊重科学、不尊重客观规律的亏。领导干部一定要虚心向专家求教,情况不明就拍板定案是不行的。对有限的农业投资怎么用才更有效,一定要听取各方面专家的意见,不能个人或少数人说说了算。

(十)搞好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农业区划和长远规划。从大的农业区划,到每个公社、大队和生产队都要搞。这是我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发展生产的科学依据,也是搞农业现代化的一项基础工作。我们讲的农业“八字宪法”都同它有关,搞长远规划和农业基本建设也离不开它。在农业内部如何布局,哪里宜农、哪里宜林、哪里宜牧、哪里宜渔,也要以自然资源和社会条件的调查为依据。

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最终目的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保证中国10亿到12亿人口(到本世纪末)能够吃好吃好,是一件大事。如何利用自然资源、保护自然资源、发展自然资源(再生资源),是一个需要严重注意的问题。只有清醒地认识我国农业发展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才能下定决心克服困难,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来改造中国建设中国。我们的事业是伟大而艰巨的。只要坚持勤俭建国艰苦奋斗的方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大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灿烂的。

调整国民经济 搞好综合平衡

薛 幕 桥

一 此次国民经济比例 失调的特点

这次国民经济的调整,是1978年冬党的三中全会后提出来的。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大家都承认经过十年浩劫,国民经济已经达到崩溃的边缘。面对这种情况,有两种方针可供我们选择:一种是

象一个人生了一场大病那样，需要拿出几年时间来休养生息，调整国民经济内部关系，使压缩了二十年的人民生活逐步有所改善。另一种是“四人帮”压在我们头上的盖子（“唯生产力论”）已经揭开了，有条件大干快上，苦战几年，夺回在“文化大革命”中丧失了的十年时间。这时由于大家对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程度还没有认识清楚，有些同志不认识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犯了“左”的错误，还在批判“极右路线”，所以我们选择了后一种方针。1977年在农业中发动了“全国农业学大寨”和“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两个“大办”，把人力、物力、财力集中使用在长期建设方面，把当年的农业生产耽误了，许多地区（特别是山西）还在推行大寨那一套“左”的东西，结果这一年的农业生产没有增长。工业生产由于整顿了“四人帮”所造成的混乱局面，上升的速度是很快的（14.3%）。1978年在农业中开始纠正“左”的错误，生产迅速回升（9%），工业生产上升的速度仍然很快（13.5%）。这一年还出现一个新的情况，由于我们向世界市场打开大门，许多国家争向我国投资。这时我们的头脑更加热了，要求大干快上。

应当指出，这时候我国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已经相当严重。这个比例失调，已经有二十年的历史，从1958年就开始产生了。“三年大跃进”比例失调达到很严重的程度，1961年起进行调整，到1965年才开始恢复比较正常的状态。我国的工农业生产浪费了八年时间，1965年工农业总产值虽然已经超过1957年的水平，但由于人口增长，生产效果降低，积累所占比例仍然太大，人民生活还比1957年的水平低一点。这时候绝大多数同志虽然认识了“三年大跃进”的错误，认为五年调整是正确方针。但是当时不准批评“大跃进”，还要年年“高举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中还反过来狠批五年调整中的“退要退够”、“关停并转”等一系列正确措施，说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粉碎“四人帮”后，大家仍然心有余悸，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候不敢触犯“三年大跃进”和五年调整这个禁区，所以经济工作中二十年的“左”倾错误不可能迅速纠正过来，1978年又一次重犯了大跃进的错误。三中全会开始批判“左”倾路线的错误，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把这个禁区冲破了，认识了国民经济仍然比例失调，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并且指出调整是关键。这是我们三十年来经济工作的又一转折点。

此次调整的中心，是压缩经济建设规模，省出钱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一次转变相当困难，原因是和六十年代初期的调整大不相同。上次调整是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人民生活遇到严重困难。城市人民吃不饱饭，农村发生严重的饥荒，大家都感到非调整不可。此次调整是工农业生产上升，人民生活改善，因此大家感觉不到有调整的必要性。这一次冒进，从1970年就开始了，此后十年积累率年年超过30%。1978年又一次“大跃进”，财政预算中的

基本建设拨款猛增50%，积累率达到36.5%，接近“三年大跃进”的水平（39%）。这十年经济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是用压低人民消费水平来实现的。1976、1977年农民每人平均口粮低于1956、1957年，职工的平均工资也下降了，城市副食品的供应愈来愈紧张。与此同时，工业内部也比例失调，不但轻工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重工业，而且在重工业内部，能源和许多种原料的生产满足不了生产和建设的需要。许多工厂由于缺电，每星期停工两三天。许多建设单位停工待料，长期完不成建设任务。许多生产建设单位采购人员满天飞，看到短缺物资就抢购，自己用不着就放在仓库里面，用作交换自己需要物资的筹码，这样又加剧物资供应的紧张。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盲目追求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许多工厂为着完成增产计划，产品质量下降（质量不好也有人要），成本上升，产品不符合市场和用户的需要，有些产品供不应求，有些产品在仓库中积压，造成了巨大的浪费。还有许多厂矿为着突击完成生产任务，机器设备长期失修，采掘比例失调，寅吃卯粮。这种局面是很难长期维持下去的，如不及时纠正会使国民经济趋向崩溃。

三中全会提出压缩基本建设战线，降低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并下决心改善人民生活，这个方针无疑是完全正确的。问题是在执行中没有进行综合平衡，基建投资压不下去，计划内的投资没有完成压缩任务，计划外的建设显著地扩大了，加起来比上一年还略多一点。改善人民生活突破了原定计划，1979年工农业总产值增加8.5%，商品供应量增加11%，而社会购买力却增加20%。因此就出现了建国以来最大的财政赤字，并因此而多发了一点货币，物价难于稳定，人民对此不满。1980年进一步压缩计划内的基本建设投资，但计划外的仍在膨胀，加以上年增加的工资大部分推迟到这年来实现，还多发了不少奖金，因此财政情况并没有多少改善，仍然有相当大的赤字，货币发行继续增加，这就为现在稳定物价造成更大的困难。现在由于人民生活改善，市场商品供应增加，人民币的信用还是稳固的，城乡储蓄不断增加，巨大的财政赤字有相当大一部分可以用银行存款来弥补。但是，如果这样的情况继续发展下去，1981年又有大量的财政赤字，被迫增发货币，物价上升到一定的限度，人民币的信用有可能发生动摇，象六十年代初期那样许多人向银行提取存款，排队抢购商品，就有可能使物价上升无法控制，几年来人民所得到的一点好处被物价上涨所抵销了。所以中央最近在召开计划会议的同时，召开省长会议，中央工作会议，大幅度压缩1981年的基建投资，并相应地压缩了一部分事业费、行政费、国防费，还要制止乱提物价和滥发奖金，以确保1981年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

这一次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是过去二十年，特别是近十年积累起来的，调整两年效果不大，有两方面的原因：主要的是积累基金压不下去，计划内的投资仍然过多，计划外的投资失去控制；次要的

是消费基金也增加得多了一点,从1970年到1978年,社会购买力平均每年增加92亿元,1980年一年就增加200亿元。这样,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安排合计,就超过国民收入生产总额,产生财政赤字,并因此而引起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过去两年银行存款大幅度增长,可以用来弥补一部分财政赤字,但仍然增发过多的货币,这是近两年物价上升的根本原因。克服这个困难的主要办法,第一是继续压缩计划内的投资,不但国内的许多重大建设项目要下马,连从国外引进的许多项目也要停建缓建。基本建设上马容易下马难。许多下马的建设项目,机器设备已经订货甚至制造出来了,不但要收货付款,而且要造仓库来保管维护,已经招收的几十万职工不能迅速遣散,在未安排好出路前还要照发工资。特别是从国外引进的项目,已签订的合同无法取消,损失更大。

第二,严格控制计划外的建设。多年来我们的基本建设投资集中过多,地方的机动财力太少,不能进行本地区急需的建设。特别是企业利润全部上交,没有财力来进行必要的挖潜、革新、改造。前两年逐步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地方实行财务包干,企业实行利润分成,地方和企业掌握的资金显著增加。这些资金,一部分用来进行投资少、收效快且为国家急需的建设,效果是很好的。但是,由于国家没有控制,地方和企业也用相当大一部分的资金进行了重复浪费的建设。如产棉地区办了很多小纺织厂,产烟草的地区办了很多小烟厂,使原来的大工厂因为缺原料而被迫减产,从全国范围来看造成很大的损失。从1981年起,国家对地方较大的建设项目和企业较大的扩建改建项目都要进行严格的控制,层层审批。与此同时,还准备用国库券等形式吸收地方和企业多余的资金,由中央集中使用于国家最急需的建设。

第三,对人民生活的改善也必须控制,在目前特别要控制滥发奖金的现象。“文化大革命”中完全取消奖金是错误的。这几年恢复奖金制度,用来奖励那些超额劳动、增产节约和有特殊贡献(例如发明创造)的职工,从方针来说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许多企业巧立名目,普遍发放奖金,最多的达到基本工资的一半上下。这不但大大地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引起各行业、各企业、各地区之间的苦乐不均现象,对因无营业收入而不能发奖金的教育、卫生、机关、团体工作人员影响更大。这种现象如果不加控制,有可能出现因奖金过多而刺激物价上升,反过来又因物价上升而被迫多发奖金的恶性循环。国家正在采取种种措施,来制止滥发奖金的现象。

第四,近几年机关、团体、会议的膨胀,事业费、行政费、国防费的增加,也已经超过了国家财力的可能。今后几年我看有必要采取抗日战争时期的“精兵简政”方针,把几年来过分膨胀的空气压缩一下。总之,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考虑有几亿人民生活还很困难,不可能把应办的事在几年内都办完,要坚决反对铺张浪费。

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来几乎普遍犯了一

个错误:大家都想生产发展得快一点,所以把经济建设规模搞得太大,积累所占比例过高,使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有些国家想把人民生活也改善得多一点,消费基金的增长有时候超过生产的增长。这样国家分配的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安排合计,超过了国民收入,引起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如果物价随之上升,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都部分地被涨价所抵销,实际实现的数额仍然不能超过国民收入。多数国家用财政补贴来制止计划价格的上升,结果增加财政赤字,加剧通货膨胀;为着稳定物价,又不得不增加财政补贴。有些国家由于这种恶性循环,财政所支付的物价补贴高达财政总支出的30%~40%,摆脱不了这个恶性循环的困境。我国现在的物价补贴,也已经达到财政总支出的20%。我们必须下决心来做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工作,坚决压缩积累基金,控制消费基金,务必使两者合计不超过国民收入总额,从而保证财政收支的平衡,控制货币发行数量勿使超过市场流通需要,这样就可以保持市场和物价的稳定。在财政收支平衡,物价完全稳定以后,我们就有可能来逐步调整价格,缩小物价补贴,使国民经济达到全面的平衡。

二 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

我国现在已经有将近十亿人口的国家,其中大约有八亿是农民,多数农民的生活还有困难。一部分职工的生活也有困难。因此,保证人民生活随着生产的增长而逐步有所改善,是我们编制国民经济计划,进行综合平衡所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总结三十年的经验,我们必须至少用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三来保障人民生活,因此积累所占的比例一般只能保持在25%上下。在工农业生产中,我们首先应当发展农业,其次是轻工业,在这基础上来逐步发展重工业(所有发达的工业国都是按此程序发展起来的)。我们经济建设的规模,也只能随着重工业的发展而逐步扩大。在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上,我们应当首先安排人民生活,其次再按财力物力的可能来安排经济建设。当然,经济建设也是很重要的,没有一定的建设规模就不能保障生产的迅速发展,从而也就不能保障人民生活的持续改善。但是,如果我们经济建设的规模超过了财力物力的可能,那么不但会使人民生活长期不能改善,且使建设计划也因为缺乏物质保证而难于完成。

人们在从事任何工作以前必须首先把肚子吃饱,其次要身上穿暖。所以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生产发展的水平愈低,积累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愈小。原始共产社会全部生产只够维持生活,几乎没有积累,所以要过几千年,甚至几万年生产才能有比较显著的增长。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有了剩余劳动,但是积累所占比例仍然很小,所以生产的发展很慢。资本主义社会剩余劳动显著增加,生

产增长较快，十八、十九世纪生产的增长超过了过去二、三千年。二十世纪生产水平更高，可能积累的资金更多。虽然受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产生的生产过剩限制，生产增长的速度又远超过过去两百年。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平均每人的国民收入已经达到五千美元上下，积累率一般还只有15%至20%（只有日本有一时期超过30%）。我国平均每人的国民收入还不到250美元，如果要把人民生活安排得好一点，积累率就只能保持在20%上下。为着提高生产发展速度，把积累率提到25%上下，已经可以说是高水平了。三十年的经验是，积累率保持在25%上下，还可以保持高速度，超过30%就会逐渐走向比例失调，甚至引来“经济危机”。

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积累率上升到接近40%，引起严重的“经济危机”，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生产相继倒退，人民生活显著下降。1961年到1963年进行调整，积累率降到20%以下，1963年到1965年工农业生产就迅速回升。历史证明高积累不一定引起高速度、高消费，走过了头有可能向相反的方向发展。那时候由于我们没有可能总结这八年的经验教训，1966年积累率又上升到30%，接着就被“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全面内战”打乱了。1970年以后局面比较稳定一点，积累率又年年超过30%，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愈来愈严重。此后七、八年的高积累，不但使人民生活长期不能改善，而且生产和建设内部比例也愈来愈失调。为着盲目追求10%以上（工业）的高速度，就不断扩大经济建设规模。经济建设规模大了，生产资料供应严重不足，因而又要求提高重工业的增长速度。水多加面，面多加水，永远没有止境。直到粉碎“四人帮”后，1977、1978年还提出了1985年生产六千万吨钢，二亿五千万吨原油和八千亿斤粮食的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为着实现这个目标，就提出“十个大庆”、“十个鞍钢”、“十个开滦”等缺乏根据的计划，造成现在的被动局面。

三中全会以后“压缩空气”，中央领导同志建议取消六千万吨钢等高指标，要做到计划不留缺口（财政收支平衡，物资供求平衡）。为此就要大大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把积累率降到25%。这时候就发生争论，有不少长期做经济工作的同志说：“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降低积累率就会降低生产发展速度，就不可能改善人民生活。根据他们计算，积累率如果降到30%以下，生产增长速度就会大大下降；积累率降到25%就没有增长速度了，人民生活就会随着人口的增长而逐步下降。据说这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经过实际计算，是有充分根据的。这一来，把许多同志吓唬住了，都不肯让那些超过客观可能的建设项目下马。他们说的“客观规律”究竟对不对呢？如果建设规模不超过客观可能，这是对的。问题是现在建设规模已经远远超过客观可能，计划不但不能留有余地，而且留着很大的缺口。几年前钢材、煤、电、水泥、木材、运输等没有一样能够保证供应。不但经济建设

的物资供应留着很大的缺口，生产方面的物资供应也留着很大的缺口，许多工厂由于供电不足，只能“开四停三”、甚至“开三停四”。建设供应不足挤生产，重工业供应不足挤轻工业，它们又共同挤农业。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已经明如观火，可是还有些长期做经济工作的同志视而不见，使前两年的调整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

这些同志还有一套理论，就是过去二十多年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平均保持在10%以上，1977年到1978年达到14.3%和13.5%。1979年一调整，工业增长速度就降到8%（计划数，实际完成8.5%）。1980年再调整，又下降到6%（计划数，实际完成8.4%）。1981年又进行这样大幅度的调整，工业增长速度估计至多只能达到3%~4%。积累率降低，生产增长速度也下降，这不是已有事实证明了吗？实际情况是怎样呢？1977、1978年的工业增长不但属于恢复性质（1976年工业生产没有增长），而且有相当大的虚假成分。许多工厂为求完成生产计划，产品质量下降，成本上升，特别是生产了许多市场和用户不需要的产品，在仓库中积压。速度最高的机械和钢铁生产，产品积压也最严重。这样的高速度究竟带来什么样的经济效果呢？

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增长1%~2%是低速度，3%~4%是中速度，5%~6%已经是高速度。由于经济效果高，人民生活在过去二十年改善比我们快。它们是低速度、低积累、高效果、高消费；我们恰恰相反，是高速度、高积累、低效果、低消费。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原因就在我们的速度和积累已经远远超过客观可能。生产和建设留了这样大的缺口，怎么能够保证经济效果呢？1979年和1980年主动降低生产指标，效果就比较好一点。1979年许多工厂能够比较合理地安排生产，有些工厂仍然因为追求速度，生产了不少积压产品。1980年把计划增长速度降到6%，实际完成与上年相仿，效果可能比上年又好一点。由此可见，不切实际的高速度是生产低效果的主要原因，不切实际的高积累是建设低效果的主要原因。七十年代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比较，生产和建设的效果都显著地降低了。就是因为生产速度和建设规模都已经远超过客观可能。经济工作中的“左”的错误，不但已给国民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失，如果继续发展下去，还会对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

这些同志又说，我们也主张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但是已经上马，下马要造成巨大的浪费。是的，下马的浪费是很大的，但不下马又如何呢？按1978年所规定的规模干下去，不出三年积累率又会上升到接近40%，肯定会再来一场大倒退，大灾难。1978年决定上马的项目，它的后果不表现在1978年、1979年（这时大多还在做准备工作），而主要表现在八十年代初期，因为这时候才达到建设的高峰。1979、1980两年，我们两次压缩基本建设投资，有许多大中型项目下马，但这些项目的投资不可能完全减下来，已订购的机器设备还要付款，建设队伍不能迅

速遣散。1981年有更多的大中型项目下马,虽然可以节省大约200亿元投资,但所付的“下马费”将比前两年更多。特别是从外国引进的项目、订购的机器设备如何处理,比国内的产品更困难。这种情况,还要继续三、四年,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我们调整的困难,这是我们前两年虽然下了一批建设项目,仍然出现大量财政赤字的重要原因。但不下马,困难无法克服。只有决心下马,忍受几年困难,才能从被动转入主动。

更加重要的是,我们的许多引进项目,不但在建设时期是我们沉重的负担,即使建设完成,也得不到好处,甚至使我们更加困难。因为我国现在缺乏能源,交通运输也是短线。引进的二十二个项目,绝大部分不是增产能源,而是要消耗大量能源(耗油、耗煤、耗电),并使交通运输更加紧张。特别是宝山钢铁公司,几套石油化工设备,都是如此。化肥、化纤是我们所需要的,但如果建成以后缺乏原料(原油),缺乏电力,被迫停工,我们将用什么来对外国贷款还本付息呢?所以这些项目建成以后,可能仍然成为我们沉重的负担。迟下马不如早下马。下马不能不忍受巨大的损失,不下马将来所受损失更大,这是我们过去两年反复考虑,现在仍然只能下决心停建缓建的重要原因。今后我们仍然不拒绝利用外资,但是必须时期长,利息低,主要用来进行能源和交通运输方面的建设,现在我们在东海、南海、渤海利用外资进行海底石油勘探,就属于这种性质。此外,投资少、见效快的象来料加工等类的建设,现在还可以继续进行。

前年原油、煤炭很少增加,去年还略有下降,但我们的工业生产仍然是高速度(8%以上)增长。1981年煤炭、原油可能继续下降,因此工业生产的发展困难更大。能源不能增加,是不是前两年压缩经济建设投资造成的呢?显然不是,一方面我们在压缩投资的时候,能源的投资不压缩、少压缩。即使压缩,也要在五、六年后才会产生后果。这几年原油、煤炭不能增产,甚至下降,是前几年为求提高当年产量,采掘(煤炭)、采勘(石油)比例失调,寅吃卯粮所造成的。我们用什么方法来保证工业增产速度呢?一个是节约消耗。另一个是改变工业结构,即多发展轻工业,少发展重工业。二十多年来我国重工业的增长速度几乎年年超过轻工业,这两年倒过来了,轻工业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重工业(1980年轻工业增长17.4%,重工业增长1.6%)。这不但可以保持工业增长速度,而且可以保证市场商品供应,使人民生活能够逐步有所改善。

1980年由于缩小建设规模,许多机械工厂任务不足,面临着减产停产的困境。多年来我国机械工业过分膨胀,必须进行合并改组。任务饱满的时候,谁也不愿意关停并转。现在任务不足,它们就很容易接受合并改组。如果把现有机械工厂减少一半,甚至减到十分之一,它们的生产能力不但不会下降,且有可能上升。任务不足还可以迫使它们不能不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改制适合市场需要的新产品,为

老企业的设备更新和技术革新服务,还可以开辟国外市场。从长期来看,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钢铁生产今年准备适当降低。过去钢材由于盲目追求产量,不注意产品适销对路,品种规格太少,以致一方面大量进口钢材,另一方面库存积压钢材愈来愈多。降低产量以后可以增加品种规格,减少库存积压,不但不会增加进口,相反的还可以减少进口。许多钢铁工厂过去由于突击完成生产任务,机器设备长期失修,现在也可以有机会来检修机器设备,进行一些技术革新和试制新产品。从机械、钢铁两个行业节省出来的大量能源,如果用于发展轻工业生产,工业的增长速度就不会下降,仍然是高速度。这种工业经济结构的改组,将使我国经济发展摆脱不适合于我国国情的畸形状态,逐渐走上清醒的健康道路。

改革服从调整

改革促进调整

于 光 远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继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建立和对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生产关系方面又一次伟大的变革。批判现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缺点,寻找更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克服实行新经济体制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使新的经济体制获得巩固,在实践中经受检验并不断完善,将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国民经济调整,也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而且是十分艰苦的工作。它的目的是克服历史上形成的国民经济严重不平衡和产业结构、生产力配置等不合理状况。调整任务的完成也不是一、两年的事情,也需要用若干年的时间。

改革和调整都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它们各需要多长的时间,现在很难说得准确。由于任务不同,我们没有理由来说,两者所需的时间一定是一样长的。我认为,很有可能改革所需要的时间会更长一些。如果实现改革的过程和实现调整的过程时间不一样长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改革并不永远同调整相联系。但是在今天,调整是我国经济建设(也可以说是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中心工作。目前我国正处在调整时期。在这期间,改革和调整是同时进行的,改革和调整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在调整时期,改革不是与调整相独立,不受调整制约,不对调整发生重大作用的。同样,在调整时期,调整也不是在改革停止了的情况下进行的,不是依靠原有的体制来进行的调整。于是在调整时期就有一个改革和调整之间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的问题。能不能进行改革时不去考虑调整的任务?能不

能先进行调整,把改革暂时放在一边?这样的问题应该承认是很重要的。即使没有人那样明确地主张,但是为了在指导思想上加明确起见,是应该讲清楚的。

对于在调整时期,调整 and 改革之间基本的关系,我认为可以用“改革服从调整,改革促进调整”这样一句简明的话来表示。这句话的意思就包含上面说过的:(一)调整 and 改革应该同时进行,在调整中改革仍是必要的,不能因为要实行调整而中止改革;(二)改革不是一个自顾自的东西,在调整时期,它从属于调整;(三)要充分发挥改革对调整的促进作用。

关于为什么改革必须服从调整,我们可以举出下面几点理由。

一、调整问题很复杂,工作量很大。如调整方案要很好地拟定;调整中的问题要进行预测;调整的进程要密切注意;调整中的问题要及时解决。因此各级政府中的经济管理机关,以及从事理论研究的经济学工作者,需要集中更多的力量在调整工作方面。对改革还是要用很大力量去抓,但是,既然调整工作更加迫切,就不可能用更大力量去搞改革。这是从力量分配上来看的改革必须服从调整的理由。

二、扩大企业和地方管理机关的权力,使之拥有比现行体制中更大的权力,这是改革的正确方向。但是中央管理机关对全国社会主义经济集中和统一的管理,本来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本质的要求。体制改革并不否认集中和统一,只是确认这种集中和统一必须适度。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央管理机关对国民经济实行适度的集中和统一,同针对现行体制中的缺点而提出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方针,同中央和地方管理适当分权,是可以而且应该很好结合的。在目前,为了压缩财政开支和调动企业、地区的财力,来取得财政和信贷平衡,要求强调一下集中,这决不意味着否定一年多来改革的成就,走回头路。如果那样去理解,就大错特错了。但是在调整中,企业自主权的某些方面,如进行基本建设投资的权力,就不宜放得过宽;地方管理机关的权力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限制。此外,还有一些改革措施,它对调整所起的作用,一下子还是难以确定的,它的推广也应适当放慢。当国民经济中潜在危险不再存在后,我们就可以加快改革的步伐。这是从改革对调整的作用来看的改革必须服从调整的理由。

三、有许多改革措施是要以国民经济的调整为前提的。例如没有合理的价格结构,各部门、各企业就不能得到合理的利润(或亏损),因此关于利润留成、税收、职工工资与福利等就不能做到合理。这对于改革的进行妨碍极大。但是在价格合理化的过程中,常常遇到这样一种情况,把产品出售价格向下调整时,生产这种产品的工厂利润就会减少;而把产品出售价格向上调整时,使用这种产品的工厂成本就会增大,利润也会减少,使用这种产品的居民也要受到损失。这些工厂就有可能提出要政府解

决困难,要求少交税,甚至要求补贴。居民的损失问题也要解决。而在调整时期,这一点是很难做到的。这就要求强调把调整工作做好,把生产搞上去,使经济体制改革工作能够更好地进行。这是从调整是实行改革的条件来讲,改革必须服从调整的理由。

关于改革促进调整,我们也可以举出下面几点理由。

一、调整就是要改变历史上形成的国民经济结构上的许多不合理的状况。而这些不合理的状况很大程度上就是经济体制的缺点造成的,而旧的经济体制,对于调整,正起着某种阻碍作用,所以有必要通过改革从根本上来为调整排除阻力。

二、某些调整措施本身就是体制改革措施。例如“关停并转”四个字中的“并”就是实行联合。而在实行联合中就会常常遇到各个企业不能超越本部门、本地区去与外部门、外地区进行联合这种不合理经济体制的限制。因此为了联合,就要去打破这种限制。这就是要去实行体制方面的改革。“转”也不应该受部门、地区的限制。而且在实行“转”的时候,就有一个在国家指导下充分利用市场积极作用的问题。这也是属于体制改革范围内的事情。

三、调整不只是减少基本建设投资,压缩开支,更重要的是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发展那些应该得到更快更大发展的产品的生产。只有这样,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也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原先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有更多的适销产品来回笼货币。而要取得这样的发展,依靠原有的体制是做不到的,因为正是原有的经济体制严重的阻碍生产的发展。体制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只有在调整时期同时进行改革,社会需要的产品才会以比较快的速度增加。

总之,调整是一个积极的方针。在调整时期,我们要做很多事情,要解决很多问题。我们一定要切切实实地把一件一件事情办好。这样调整的任务才能胜利完成。但是大家都知道,旧的经济体制,把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束缚得紧紧的。我们要比较有效率地办成一件事,不遇到经济体制方面的妨碍是极少的。我们要进行体制改革,为顺利地完 成调整工作开路,对这一点,我想用不着举什么例子,因为在实际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是非常之多的,同志们一定可以举出许多这样的事例出来。

以上我们分别讲了改革服从调整 and 改革促进调整的一些理由。还应该指出,在调整时期,调整 and 改革的关系既然是“改革服从调整,改革促进调整”,那么,我们在考虑改革方案、改革措施时,就一定要研究,怎样的方案、措施更能够促进调整。用这样一个指导思想进行工作,我们就可以在改革问题上更大胆一些、更积极一些。

关于调整 and 改革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当前经济工作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两者之间的关系如果处理得不好,就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损失。对这一点,在一些人的头脑中并不是很清楚的。关于调整与改革间的关系问题,本来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

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要求在处理问题时，对具体的问题作具体的解决。在这篇短文中，作者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具体的讨论，而只一般地讲讲两者之间的关系，提出题目上写的“改革服从调整，改革促进调整”这样一句原则性的话。文中可能讲的不妥当的地方，请读者指正。

从美国农业发展的历史 经验看中国农业发展

钱 俊 瑞

漫长的道路

美国农业，由自给性的生产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花了近百年时间；由落后的农具过渡到初步机械化，花了八十年时间；高度机械化和现代化是二次大战结束后才实现的。

美国这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确实是从农业起家的。美国农业为美国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批的粮食、原料和劳动力，提供了广阔的国内市场。美国农业的现代化，经历了漫长的年代。美国从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花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由原始的、自给性的生产逐步向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过渡。当时，美国农业不但为国内提供了大量廉价的粮食、肉类和工业原料，而且农产品成了美国最主要的出口物资，从西欧换回大批美国工业发展所需的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有力地促进了美国工业的发展。1810~1860年，美国农业总产值增长了5.4倍，同期工业总产值增长了近9倍。但当时美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1859年美国农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仍占到64%。1860~1900年，美国农业总产值又增长了近两倍，与此同时，工业生产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十九世纪后期，工业总产值开始超过农业总产值。1884年，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上升到53%，1889年又上升到62%。

美国工业和农业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是很明显的。工业上去了，反过来又为农业的发展和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美国从南北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用了八十年左右的时间，美国农业才逐步由落后的原始工具，经过畜力农机具的阶段，过渡到初步实现农业机械化。而美国农业的高度机械化和现代化，则是在二次大战后才全面实现的。目前，美国农业已经实现了全盘高度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和良种化，并在农业中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如电子仪器 and 激光等等。

劳动生产率高 商品率高

美国每个农业劳动力能养活59人，而我国只能养活3~4人。

美国农业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2%，而粮食产量却占世界粮产的20%，出口量占世界粮食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

随着农业现代化的逐步实现，美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1820年，美国每个农业劳动力，只能养活四个人；以后大约用了一百年的时间，到1920年，才能养活8个人，翻了一番；到1950年，又翻了一番，能养活16个人；1970年能养活47个人，1979年能养活59个人。而我们中国目前每个农业劳动力只能养活3~4个人。虽然美国农业单位面积产量不算很高，1978年亩产粮食只有465斤，我国是337斤；但是，美国农产品的商品率很高。美国人口只有2亿2千多万，比我国少得多，仅占世界人口总数的5%，1977年从事农业的人口又只占全国人口总数的3.6%，但生产的粮食占世界粮食总产量的20%左右。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1977年，美国农产品出口额约占世界农产品出口额的18%。其中，粮食占世界粮食出口额的一半以上，大豆占到70%以上，棉花占到27%。美国手中掌握的农产品，今天已成为它和苏联争霸世界的一个重要武器。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时，美国就是把对苏联实行粮食禁运作为一个制裁措施。

关于我国农业

农业搞上去我国就好办建设了。8亿农民安定团结了，全国也就安定团结了。

我国是一个10亿人口，8亿农民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家进行建设，更必须首先把农业搞上去。农业搞上去了，我国的建设就好办了；8亿农民安定团结了，全国也就安定团结了。过去我们说农轻重，实际上还是照苏联模式，搞重轻农。三中全会以后由于批判了“左”的错误，制定了一系列符合我国农村实际的经济政策，提高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才使农业生产出现了崭新的局面，连续几年都取得了好收成。现在我国经济建设正在进行大调整，该进的进，该退的退。对农业来说决不是退的问题，而是要一靠政策，二靠科学，大大地搞上去。这一点连美国的经济学家也看得很清楚。1980年我去美国讲学，在费城同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莱因交谈的时候，他就很强调以农立国的重要意义。克莱因认为中国经济中有两个大问题，一是农业，二是人口。如果你们中国把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农业搞好了，人口控制住了，你们这个国家就了不起。他说得很有见地，很对。

美国农业有三点 可供我们借鉴

农业生产的地区专业化；
农工商联合形成供产销一体化；
重视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教育。

美国农业发展过程中，有三个特点特别可供我们借鉴。

一是实行生产专业化。这就是根据各个地区不同的自然条件，为发挥本地区优势而形成的农业生产上的地区分工，也就是农业生产的地区专业化。美国目前已形成若干个不同农作物和畜牧业的集中产地。例如，著名的玉米带地区，从俄亥俄州一直延伸到明尼苏达州，这是美国中部大草原，气候温暖，土壤肥沃，雨水充足，适宜玉米的生长，成了玉米集中种植的高产地带。其他还有小麦、水稻、烟草、棉花、甜菜、甘蔗、马铃薯等的集中产地。

二是发展农工商联合企业。所谓农工商联合企业，就是农业生产同与它有关的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产品的加工、贮运和销售等行业结合起来，形成供、产、销经营上的一体化。这是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的经营体制，也是美国目前所谓“现代农业”的概念。农工商联合企业的发展，大大减少了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增加了支农工业、农产品加工工业和销售方面的人员。

三是重视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教育。美国政府对于农业科研给以大量拨款，如1970~1977年，联邦政府用于农业科研和服务事业的经费，由7.3亿美元增加到11.3亿美元，目前达到每年约15亿美元。美国还建立起庞大的农业科研和推广系统。公营机构的农业科研人员约18,500多人，私营机构的科研人员与公营机构的人数差不多。各州各县都建立了农业试验站或推广站，配备技术推广员。全国农业技术推广员约有11,500多人。同时，美国很重视农业教育和农业科技人员的培养工作。1976年，美国农、林、牧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近2万人，获得农业专科学位的约25万人，受过中等农业职业教育的多达106万人。此外，通过办训练班、巡回教学、函授、电视、广播等多种形式，普及农业技术教育。

我们应当结合我国实际，认真参考美国农业发展的这些特点，学习他们的长处，克服我们的缺点，解决我们的问题，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蓬勃发展。

一分为二看待美国经济 力求避免片面性

我们看待美国经济和美国社会，必须坚持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力求避免片面性。美国有它的长处和优点；也有它的短处和阴暗面。它现代化程度

高，富足；但贫富悬殊太大，阔人生活腐朽放荡，穷人难得温饱，不少靠卖淫、偷抢为生。吸毒严重，社会秩序很不安宁。总之，美国这个最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绝对不可能克服的。这是任何一届美国总统和任何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无法解决的。美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是伟大的、优秀的，他们有英勇斗争的光荣传统。在工人阶级的正确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艰巨的斗争，他们必然会赢得最后胜利。

建国以来国民经济 的发展和顿挫

许 涤 新

一、三十多年来我国国民经济 恢复和发展的四个阶段

建国以来，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可以分为四个时期，这就是：①1949~1952年的国民经济恢复；②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③1962~1966年的调整国民经济的成就；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执行和国民经济的可喜的好转。兹分述如下：

在解放前的一百年间，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帝国主义列强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对外贸易和交通事业，垄断了中国的银行和财政。他们不仅在中国境内经营了许多轻工业和重工业，并且从通商都市到穷乡僻壤，建立了一个买办的商业高利贷剥削网。地主和富农，占农村人口不到10%，却占有全部耕地的70%以上。他们分散地把土地租给农民，对农民进行沉重的封建剥削。单以地租来说，地租率一般占农产物收获量的一半，高的竟达80%。他们每年从农民手中夺走的粮食在700亿斤以上。而以国民党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垄断资本，由于接收了日、德、意在华财产，在解放前夕，占中国全部工业资本的三分之二，占中国全部工业交通运输业的固定资本的80%。在这个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之下，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是没法得到发展，经济文化是没法不陷在极端落后的境地之中的。

在全国解放的那一年，现代工业总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而这一点可怜的现代工业的大部分又集中在外资所控制的沿海城市。旧中国的人口是5.4亿（指1948~1949年）。但是，钢的最高年产

量只有90多万吨，原煤只有6,000余万吨，发电量不到60亿度，粮食的最高年产量只有2,700多亿斤，棉花不到1,700万担。在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政府已经陷入财政破产的深渊，这个反动政府用以应付财政破产的办法是疯狂地印发钞票。抗战八年，它发行的伪法币是5,569亿元。从日本投降到1949年8月，连以前的发行额达6,636,944亿元。伪法币成为废纸。国民党又于1948年8月改发伪“金元券”，每元合法币300万元。到1949年4月，伪金元券发行额达516,124亿元，也成为货真价实的废纸。从抗战开始到1949年5月的十二年间，国民党反动政府增发钞票1,400多亿倍，而同期物价上涨85,000多亿倍。在那个时候，中国人民不但在政治上受到封建法西斯的残酷压迫，而且在经济上过着物价一日数变、朝不保夕、饥寒交迫的生活！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就是在上述那种生产衰落、物价飞涨、城乡破产、民不聊生的情况下，接受国民党反动政府遗留下来的烂摊子的。从1949~1952年的三年间，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逐步改变解放前的那种悲惨局面。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解放了全国之后，就废除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国家对于对外贸易的统制，这么一来，一百年来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半殖民地的枷锁就被打碎了。

全国一解放，人民政府就立即没收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国家垄断资本。当时没收的工业企业有2,858个单位，在这些企业中工作的职工有75万余人。由于没收了四大家族的国家垄断资本，无产阶级国家就建立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经济，掌握了全国的大银行、铁路、航运以及绝大部分轻工业和重工业。

全国解放前，在解放区已有1.6亿人口的地区实行了土地改革。新中国成立后，又在全国3.1亿人口的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这个史无前例的运动，到1952年，就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的胜利，把封建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使全国的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7亿亩土地，废除了苛重的封建地租，还分得了房屋、牲畜、农具，从而摧毁了封建制度的束缚，解放了农业生产，使国内市场逐步地活跃起来。

在中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除了没收官僚资本，实现土地改革之外，党还领导全国人民，用了极大的力量医治战争的创伤，恢复和发展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长期破坏了的国民经济。在这里，有几项重要的措施，是必须论及的。首先，打击投机活动，并使人民币占领了市场。打击投机的办法，主要是采用集中物资，有计划地抛进市场，使这些物资的价格逐步下跌。当时最重要的物资是棉纱（全国各大城市是在1949年11月25日大量抛售棉纱，降低纱价的），不少投机家在这种打击之下破产了。而为了保证工人和市民的货币工资的购买力，许多城市，在人民银行开设“折实单位存款”（上海一个折实单位包括：中白粳米一斤；龙头细布一尺；花生油

一两；煤炭一斤，四种商品的综合价格。“折实单位”在上海于1949年6月14日开始，当日的牌价是302元）。“折实单位存款”的提出使工人群众的货币工资收入，不致因为市场物价的波动而受影响。这些措施收到相当好的效果。但是，市场物价的波动，并未因此就完全平息下来，为了结束国民党反动政府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1950年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实行了统一财政经济的果断措施（在此以前，由于抗战和解放战争的关系，各个战略区是独立的，财政也是独立的）。统一财经，是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从而，实现国家财政的收支平衡。因为实现了财政的收支平衡，限制了机关、部队的集团购买力，以及清理仓库等办法，不到半年，我们就成功地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全国各地的物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迅速地结束了延续十二年之久的恶性通货膨胀，从而受到国内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在那个时期，全国人民用交粮、纳税、买公债的行动支持政府，这对于在短期内制止通货膨胀和稳定物价有极大的帮助。恶性通货膨胀的被制止，为国民经济的恢复，提供了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1949~1952年我国工业产值增长145%，农业产值增长48.5%。粮、棉、煤、钢等主要产品的产量，都在恢复中得到发展。

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的实践，证明我们的党和国家，不仅在政治上掌握了正确政策，去处理外资、官僚资本和市场投机等问题，而且善于利用经济手段去处理经济问题。

在没收了以国民党四大家族为首的国家垄断资本，把它变为国营经济，并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土地改革之后，我国国民经济的成分就只有：国营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这里，私人资本同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是矛盾的；而个体经济，特别是个体农业的生产，则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党中央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和国家创造性地运用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工农联盟的理论和农业合作化的理论，结合我国革命根据地农业互助合作的经验，并且根据我国当时的具体条件：在土改中获得土地而缺少其它生产资料的贫下中农，为了避免重新高利盘剥甚至典出和出售土地，为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抗御自然灾害，采用农业机械等新技术，普遍地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党就根据广大贫下中农的这样要求，领导他们，从组织互助组着手，进而领导他们组织半社会主义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进一步又从半社会主义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达到完成社会主义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6年，全国1.2亿农户有96.3%组织到社会主义的集体农业来了。到了这个时候，我国个体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基本上实现了。

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又推动了手工业合作化的到来，到1956年底全国600多万手工业者（占手工业者总数的92%），也通过合作化，组成了10万多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同对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政策是不相同的。对于后者，党采取了没收的政策，因为官僚买办资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是人民的三大敌人之一，而民族资产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时中立，有时支持我们。因此，党对民族资本的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党和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的思想，运用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并且根据我国的具体条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利用、限制中，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过渡形式，从不定期的收购，进一步纳入有计划的加工订货、统购包销，进一步实行公私合营；对私营商业，从委托经销、代销，对于大型私营商业也实现公私合营。到1956年底，全国6万多家私营工厂和28万家大的私营商店，实行了公私合营，其余2万多家私营小工厂和200多万家小商贩，也通过合作化，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在复杂尖锐的斗争中实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和土地改革在全国胜利之后，国内主要已经转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是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的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解决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解决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矛盾的正确道路。

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证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这是中国国民经济的一场根本性的变革，是中国生产关系的一场巨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规律的生动表现。经过这一场伟大的变革，中国人民就有可能根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以及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等规律的要求，来建设，来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了。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党领导全国人民，不仅取得了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辉煌胜利，而且也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胜利。第一个五年计划原规定限额以上的工矿项目，施工694个，完工455个；而实际上，施工的项目达到921个；到1957年底全部投入生产的有428个；部分投入生产的有109个。由于新企业的投入生产和原有企业的增加生产，由于土改后农村人民在互助合作的大道上迈步前进，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就急速地在增长着。举几个例：钢的产量从1952年的135万吨，增长到1957年的535万吨；粮食产量从1952年的3,278亿斤，增长到1957年的3,900

亿斤；棉纱从1952年的362万件，增长到1957年的465万件。以速度来说，从1953~195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9.6%；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8%。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生产和建设，成绩是昭然的。在这五年中，国民经济的这种发展，在解放前的旧中国，那是梦想不到的。

由于“大跃进”的错误，由于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1961年发生严重的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为了克服这个困难，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制定一系列的正确政策和果断措施。把钢和煤的生产指标降低下来；把拉得相当长的基本建设战线，实行“保一批，停一批”的措施。在农村方面，落实了党的六十条，恢复了农村社员的家庭副业并开放了集市贸易。实事求是的，从实际出发的三年调整，很快就取得了良好的成就，很快就改转了当时那个困难的局面。周恩来同志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现在，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面好转，并且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事实正是如此。1963~1965年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5.7%，其中，工业年增长17.9%，农业增长11.1%，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4.5%。这些增长当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带有恢复性质的。到1965年国民经济不但已经完全恢复，而且开始向前发展了。这一年，钢的产量超过1,200万吨；石油从这年起实现全部自给；粮食产量接近4,300亿斤。如果按照这个稳妥而积极的方针继续下去，那么，我国的国民经济是一定能够在持续的稳妥的局面中，迈步前进的。在回顾我国国民经济的进展中，决不能忽视1962~1966年五年间的成就，何况，这个成就是在“左”倾思想的干扰中取得的。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我国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的十年。1976年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由于左的思想没有肃清，在经济方面，还是实行那种没有考虑国家的物力、财力的大干快上，急于求成地蛮干，国民经济就继续在受到灾难，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坚决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号召全党在本世纪后二十年内为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而奋斗，并决定从1979年起集中几年时间，针对着国民经济的长期比例失调，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二年半来，在压缩积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方面，在压缩拉得过长的基本建设战线方面，在发展轻纺工业方面，特别在农村实行以“包产”为特点的生产责任制，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取得了初步的可喜的成就。例如1980年的轻工业产值（为2,344亿元）比上年增长18.4%；轻工业产值在全部工业总值所占比重从1979年的43.1%上升到1980年的46.9%。农村方面，由于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地提高起来了，1980年南涝北旱，但由于农民生